

女性流动人口的流动性、抑郁情绪与烟酒使用行为的关系

林丹华¹, 方晓义¹, 蔺秀云¹, LI Xiao-ming²

(1.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875; 2WayneState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Detroit USA)

【摘要】 目的: 考察女性流动人口的流动性、抑郁情绪与烟酒使用行为之间的关系。方法: 运用问卷调查法对 866 名从农村流动到北京打工的年轻女性流动人口的流动性、抑郁情绪和烟酒使用行为进行测查。结果: 20.9% 的女性流动人口使用一种或两种物质, 20-25 岁的女性流动人口使用两种物质的人数最多; 女性流动人口抑郁情绪的发生率为 22.6%, 未婚者的抑郁发生率显著地高于已婚者; 在总体流动时间 ($P < 0.05$) 和流动城市数量 ($P < 0.000$) 上存在显著的烟酒使用行为、年龄和教育水平的交互作用; 在抑郁情绪上存在显著的烟酒使用行为主效应 ($P < 0.05$); 多层线性回归方程结果表明, 在控制了婚姻、年龄和教育水平的作用后, 女性流动人口的流动性、抑郁情绪可以显著地预测其烟酒使用行为。结论: 女性流动人口的烟酒使用行为与其流动性和抑郁情绪有关, 应该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给予积极的关注, 以促进她们的身心健康。

【关键词】 女性流动人口; 流动性; 抑郁; 烟酒使用行为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06)06-0614-0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bility, Depression and Smoking, Alcohol Use among Rural-to-urban Female Migrants in Beijing

LIN Dan-hua, FANG Xiao-yi, LIN Xiu-yun, LI Xiao-ming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10087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bility, depression and smoking, alcohol use among rural-to-urban female migrants in Beijing. Methods: A sample of 866 young female migrants was recruited to complete a quantitative survey. Results: About 21% of female migrants used one or two substances. The number of migrants aged 20-25 was the most with respect to two substances use; About 23% of female migrants experienced depression, with more unmarried migrants reporting depression than married migrants; Significant substance use, age and educational level interaction effect were found regarding total mobile time ($P < 0.05$) and number of migrated city ($P < 0.000$). Moreov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regarding depression among female migrants who used cigarette and alcohol; Mobility and depression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female migrants' substance use after controlling marital status, age and educational level. Conclusion: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among young rural-to-urban female migrants.

【Key words】 Female migrants; Mobility; Depression; Smoking and alcohol use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深入, 规模庞大的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其中, 女性流动人口的数量正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而年轻 (18-25 岁) 女性流动人口的数量是男性的 1.5 倍。数量庞大的女性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生活面临着双重的压力, 一方面, 她们与男性流动人口一样承受着对城市文化的适应问题, 在城市生活中处于边缘性地位; 另一方面, 乡村文化中性别不平等的观念仍旧在城市生活中发挥作用^[1]。因此, 研究女性流动人口的抑郁情绪、烟酒使用行为等社会适应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和现实意义, 对促进女性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以及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纵观国内有关女性流动人口的研究, 主要存在

以下的问题: 绝大多数已有研究集中在对女性流动人口生殖健康问题、婚姻状况以及对高危妇女, 如性工作者的研究上^[2-4], 而从心理社会角度考察女性流动人口社会适应问题的研究仍较少; 一些研究涉及了女性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工资收入和待遇与男性的差异及其在城市中发展的受限程度^[5], 但这些研究多为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 很少有研究从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角度考察女性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压力及其压力应对方法。而国外的研究发现, 当个体面临着压力的情境时, 他们往往运用吸烟、饮酒等行为作为应对的策略和方法^[6]。那么, 这种状况是否同样发生在我国的女性流动人口身上? 我们认为, 揭示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将更好地了解女性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生存状况、对提高她们的身心健康将起到重要的启示作用。

鉴于此, 在本研究中, 我们拟考察女性流动人

【基金项目】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资助项目 (NIH Grant No.1 RO1 MH 64878)

口的烟酒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我们假设,环境因素(如流动性)和个体因素(如抑郁情绪)与女性流动人口的烟酒使用行为紧密相关。本研究必将深入我们对女性流动人口的认识和了解,并对促进她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择从农村流入到北京打工的 18-30 岁的年轻女性流动人口共 866 人作为有效被试。根据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职业分布比率确定样本的职业特点,最终选择的职业涵盖工业(建筑业、工厂工人)、服务业(包括餐饮业、宾馆饭店、保姆小时工和修理业)、高危行业(包括娱乐业、保健按摩和洗浴业、美容美发业)和商业(如游商和固定商贩)共 11 种职业。其中年龄不到 20 岁的流动人口 174 人(占 20.1%),年龄为 20-25 岁的流动人口 497 人(占 57.4%),年龄为 25-30 岁的流动人口 195 人(占 22.5%)。

1.2 研究工具

1.2.1 烟酒使用行为 要求被试报告在过去一个月中每天吸烟的数量和喝醉酒的次数,为 5 点量表,答案为“没有吸过烟、1-5 支、6-10 支、11-15 支、16-20 支、一包以上”和“没有喝醉过、1 次、2 次、3 次、4 及 4 次以上”。为便于统计,将后 4 点答案合并后成为“没有吸过烟、曾吸过烟”和“没有喝醉过、曾喝醉过”二分变量。其中,过去一个月中每天都吸烟的被试共 94 人(占 10.9%),过去一个月中曾喝醉过酒的被试为 134 人(占 15.5%)。在此基础上进行再编码,将过去一个月中没有每天吸烟和没有喝醉酒的流动人口定义为 0(无烟酒使用行为),将过去一个月中曾每天吸烟或喝醉酒的流动人口定义为 1(使用一种物质),将过去一个月中每天吸烟并且曾喝醉酒的流动人口定义为 2(使用两种物质)。

1.2.2 流动性 包括两个指标,一为总体流动时间,要求被试回答迄今为止他们外出打工的总年数,分别为“不到 1 年、1-2 年、2-3 年、3-4 年、4-5 年和多于 5 年”;另一个为流动城市总量,要求被试报告他们曾经流动过的城市总数,为 5 点量表,从“1 个”到“5 个及 5 个以上”。

1.2.3 流行病调查中心用抑郁量表 CES-D^[7] 要求被试回答是否经常出现各种抑郁状况,总分在 0-60 分之间,分数越高表明被试的抑郁程度越严重。

1.3 数据管理和统计

运用 SPSS11.0 进行 χ^2 分析、ANOVA 方差分析和多层线性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女性流动人口的烟酒使用行为

女性流动人口中存在着较为突出的烟酒使用行为,20.9%的流动人口使用一种或两种物质。年龄为 20-25 岁的女性流动人口同时使用烟酒的人数最多,而年龄不到 20 岁的女性流动人口同时使用烟酒的人数最少。女性流动人口的烟酒使用行为不存在显著的婚姻和教育程度的差异。

表 1 女性流动人口的烟酒使用行为

		烟酒使用行为		
		无	一种	两种
总体		685(79.1)	134 (15.5)	47(5.4)
婚姻	未婚 N (%)	537(77.8)	114 (16.5)	39(5.7)
	已婚	142(83.5)	20 (11.8)	8(4.7)
年龄	<20 岁 N (%)	143(82.2)	25 (14.4)	6(3.4)*
	≥20 岁<25 岁	374(75.3)	92 (18.5)	31(6.2)
	≥25 岁	168(86.2)	17 (8.7)	10(5.1)
教育程度	小学或低于小学教育	67(88.2)	7 (9.2)	2(2.6)*
	初中教育	364(80.2)	63 (13.9)	27(5.9)
	高中或高于高中教育	252(75.4)	64 (19.2)	18(5.4)

注: + $P<0.10$, * $P<0.05$, ** $P<0.01$, *** $P<0.001$,下同。

2.2 女性流动人口的抑郁情绪

以总分 16 分为界^[8],发现女性流动人口抑郁发生率为 22.6%。未婚者的抑郁发生率显著地高于已婚者,抑郁率不存在显著的年龄和教育程度差异。

表 2 女性流动人口的抑郁情绪($\bar{x}\pm s$)

		CES-D 总分	总分≥16 分 N (%)	χ^2
总体		10.63±9.53	196 (22.6)	
婚姻状况	未婚	11.02±9.67	167 (24.2)	6.22*
	已婚	8.72±8.19	26 (13.5)	
年龄	<20 岁	11.13±10.27	39 (22.4)	2.78
	≥20 岁<25 岁	11.10±9.50	121 (24.3)	
	≥25 岁	9.01±8.74	36 (18.5)	
教育程度	小学或低于小学教育	13.12±10.92	24 (31.6)	3.76
	初中教育	10.29±9.65	99 (21.8)	
	高中或高于高中教育	10.56±8.96	73 (21.9)	

2.3 女性流动人口的烟酒使用行为与其流动性和抑郁情绪的关系

3(烟酒使用行为) \times 2(婚姻状况) \times 3(年龄) \times 3(教育水平) ANOVA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总体流动时间($F(3,822)=2.63$, $P<0.05$)和流动城市数量($F(3,821)=6.63$, $P<0.000$)上存在显著的烟酒使用行为、年龄和教育水平交互作用;在抑郁情绪上存在显著的烟酒使用行为主效应($F(2,822)=3.16$, $P<0.05$),事后比较表明,使用一种($MD=3.82$, $P<0.000$)或两种

(MD=4.90, $P<0.001$) 物质的女性流动人口的抑郁情绪显著地高于不使用任何物质的流动人口。

表3 女性流动人口的烟酒使用行为
与其流动性和抑郁情绪($\bar{x}\pm s$)

	烟酒使用行为		
	无	一种	两种
流动时间	3.84±1.60	4.07±1.50	4.45±1.30*
流动城市数量	1.61±0.86	1.93±1.10	1.91±1.18***
抑郁情绪	9.70±8.81	13.53±11.36	14.60±9.65***

2.4 女性流动人口的流动性、抑郁情绪对烟酒使用行为的预测作用

运用多层线性回归的方法, 首先强迫婚姻状况、年龄和教育水平变量进入第一层回归方程, 然后运用 Stepwise 方法将流动时间、流动城市数量和抑郁情绪送入第二层回归方程, 以考察在控制了婚姻、年龄和教育水平的作用后, 女性流动人口的流动性、抑郁情绪对其烟酒使用行为的预测作用。结果表明, 抑郁情绪、流动城市数量和流动时间均能显著地预测女性流动人口的烟酒使用行为, 女性流动人口的抑郁情绪越多、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过的城市数量越多, 她们的烟酒使用行为也越多。

表4 女性流动人口的流动性、抑郁情绪
对烟酒使用行为的预测

	B	Beta	R ²	t	P
教育水平	0.06	0.07	0.006	2.08	0.038
抑郁情绪	0.01	0.18	0.036	5.33	0.000
流动城市数量	0.06	0.10	0.053	2.75	0.006
流动时间	0.04	0.10	0.061	2.65	0.008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20.9% 的女性流动人口使用一种或两种物质, 年龄为 20-25 岁的女性流动人口同时使用烟酒的比例最高。这一数据要远远地大于在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中所做的调查结果, 例如, 一些调查发现城市女性的吸烟率为 3%, 酗酒率为 2.5%^[9], 而农村女性的饮酒比率为 3.4%^[10]。尽管这些研究在取样方法、被试年龄和研究设计上各有所差异, 无法直接地将这些数据进行比较, 但这些数据至少给我们一个启示, 即女性流动人口的烟酒使用行为处于较高的水平。同时, 女性流动人口中抑郁的发生率为 22.6%, 未婚者的抑郁人数显著地多于已婚者。这些数字说明, 女性流动人口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需要对此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在总体流动时间和流动城市数量上存在显著的烟酒使用行为、年龄和教育水平交互作用, 不同烟酒使用水平的女性流动人口抑郁情绪差异显著。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 在控制了

年龄、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后, 抑郁情绪和流动性可以显著地预测女性流动人口的烟酒使用行为。这些结果充分说明, 女性流动人口的烟酒使用行为与抑郁情绪和流动性有紧密的关系, 女性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过的城市数量越多、抑郁情绪越多, 则她们的烟酒使用行为也就越多。女性流动人口的烟酒使用行为与抑郁、流动性之间的显著关系说明烟酒使用行为可能是女性流动人口应对不利环境的一种措施和方法, 正如文化适应理论所指出的, 移民(包括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在新环境中感知到的文化适应问题越多, 越容易出现适应压力, 而吸烟、酗酒和吸毒等烟酒使用行为则成为他们应对环境压力的策略和方法^[11]。由于经常吸烟和醉酒行为对个体, 尤其是女性身心健康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危害, 因此, 我们要特别关注女性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所处的不利位置, 鉴于她们在城市中生活所经受着身份和性别的双重歧视, 一方面, 由于有效的社会支持可以提高个体心理功能的整体水平^[12], 因此我们要给予女性流动人口更多的社会支持、就业培训和指导, 降低她们在城市中的流动性, 提高她们对城市的归属感; 另一方面, 我们要更多地关注女性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生活所面临的特殊困难和问题, 关注她们的心理健康状况, 发现导致她们出现情绪抑郁的因素, 在此基础上尝试在“流动之家”等组织和机构中开展有针对性的女性流动人口心理预防干预活动, 以提高她们的身心健康状况, 并推动和谐小康社会的构建。

参 考 文 献

- 姜秀花. 社会转型期农村流动妇女的发展与限制. 理论学刊, 2003, 114(2): 121-122
- 周庆行, 蓝宝江, 刘燕. 城市流动妇女调查. 城市问题, 120(4): 76-79
- 杨瑛, 武俊青, 陶建国, 高尔生. 已婚流动妇女的婚姻及生育状况分析. 中国公共卫生, 2003, 19(3): 328-329
- 汤小玲, 陈小健, 李士荣, 倪益友, 等. 营业性娱乐场所服务小姐性病、艾滋病高危行为干预效果观察. 现代预防医学, 2003, 30(2): 275-277
- 戴霞. 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因素中的性别差异. 南方人口, 2005, 20(3): 51-56
- Chen X, Li X, Stanton B, et al. Cigarette Smoking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Beijing, China. Preventive Medicine, 2004, 39:666-673
- 汪向东, 等.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刊版).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 王兴华, 王大华, 申继亮.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6, 14(1):73-74
- 林德森, 庄润森, 陈宇琦, 等. 深圳市民健康知识和健康行为调查分析. 中国健康教育, 2004, 20(7): 610-612

(下转第 611 页)

维度扩展到不同的临床领域(外显的行为、人际关系的处理、认知模式、自我意象、客体表象、调整机制、形象的组织、情感或脾气)中去提炼^[19],特别是一些隐匿性的病理表现(隐型 NPD)。今后对这些方面的深入研究无疑会对将来的 NPD 诊断标准有所触动。

2.3 文化差异问题

DSM 中 NPD 的诊断标准一直因为文化差异上的疏漏而倍受攻击,特别是在 DSM- 中,几乎没有涉及任何有关文化的思想观点。这个问题也可能是 ICD- 10 未将 NPD 收入的一个原因。ICD- 10 是一个相对国际化的一个分类标准,而 DSM 更多地偏向于欧美人的心理学模式。另一方面,NPD 研究至今尚缺乏国际多中心的系统研究来考察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以至于许多国家在应用这一诊断时产生了困难。Smith 在 1990 年就曾报道过亚洲地区的美国妇女自恋得分比高加索地区的美国妇女明显要低^[20],这可能是不同的价值观念、历史背景、社会氛围造成的结果。国内专家认为,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应该分为七个维度,包括外向性、善良、行事风格、才干、情绪性、人际关系和处世态度,这与西方的“大五”人格模型存在差异^[21]。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一直是各种人格障碍研究的壁垒,蕴育在孔子的“不耻下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千年古训下的自恋,无论从形式、程度还是意义上又会有哪些特点,如何求同存异,保留更本质的自恋特征,允许表现形式上的差别,并在中国人的人格维度上进行归纳探索,可能会成为将来值得研究的方向。

自从哈弗拉克·艾里斯(Havelock Ellis)在 1889 年第一次将自恋引入心理学领域,有关它的理论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了,但真正开始对自恋进行临床实验研究的时间还不足 20 年,而 DSM 开始描述 NPD 诊断标准也是近 20 年的事,这绝不是单纯的时间巧合。尽管目前 NPD 的诊断标准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它为我们更科学地研究自恋提供了依据,为及时地发现和缓解这部分病人的痛苦提供了机会。

参 考 文 献

- 1 Horney K. 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WW Norton, 1939
- 2 Millon T. Personality prototypes and their diagnostic criteria, in Contemporary Directions in Psychopathology. Edited by Millon T, Klerman G. New York: Guilford, 1986. 671- 712
- 3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Washington DC: Author, 1984
- 4 Morey LC. Personality disorders under DSM- and DSM- - R: An examination of convergence, coverage, and internal consistency. Am J Psychiatry, 1988, 145:537- 577
- 5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Washington DC: Author, 1987
- 6 Gunderson JG, Ronningstam E, Smith L.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A review of data on DSM- - R descrip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1991, 5:167- 177
- 7 Ronningstam E, Gunderson J. Identifying criteria for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Am J Psychiatry, 1990, 147:918- 922
- 8 Morey LC. A psychometric analysis of the DSM- - R personality disorder criteria. Journal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1988, 2:109- 124
- 9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Washington DC: Author, 1994
- 10 Clark IA. Resolution of taxonomic issues in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1992, 6:360- 376
- 11 Geiser H and Lieberz K. Schizoid and narcissistic features in personality structure diagnosis. Psychopathology, 2000, 33:19- 24
- 12 Gunderson JG, Ronningstam E, Smith L.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In W J Livesley, The DSM- personality disorders New York, Guilford, 1995. 201- 212
- 13 Perry JD, Perry JC. Conflicts, Defenses and the Stability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Features Psychiatry, 2004, 67 (4): 310- 321
- 14 Livesley WJ, Schroeder MI, et al. Categorical distinctions in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disorder Implications for classifica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994, 103:6- 17
- 15 Luis A. Rivas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the diagnosis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2001, 23(1):22- 35
- 16 Akhtar SJ.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Descriptive feature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1989, 12:505- 529
- 17 Cooper AM and Ronningstam E.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In A Iasman and MB Ribl.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review of psychiatry, 1992. 80- 97
- 18 Gabbard G. Two subtypes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Bulletin of the Menninger Chnu, 1989, 53:527- 532
- 19 Ronningstam E. Disorders of narcissism: diagnostic, clinical, and empirical. Edited by Ronningstam E.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1998. 75- 99
- 20 Smith BM. The measurement of narcissism in Asian, Caucasian, and Hispanic American women. Psychological Reports, 1990. 779- 785
- 21 王登峰, 崔红. 中国人的人格特点(): 行事风格.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5, 13(3):258- 260

(收稿日期:2006- 05- 24)

(上接第 616 页)

- 10 陈彩虹. 渭南市农村人口饮酒行为及影响因素调查.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4, 19(5):89- 91
- 11 Johnson T, VanGeest J, Cho Y. Migration and substance use: Evidence from the U.S. 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

vey. Substance Use and Misuse, 2002, 37: 941- 972

- 12 卢卫红, 朱丽萍, 易正辉, 等.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调查.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6, 14 (2): 160- 161

(收稿日期:2006- 04- 26)